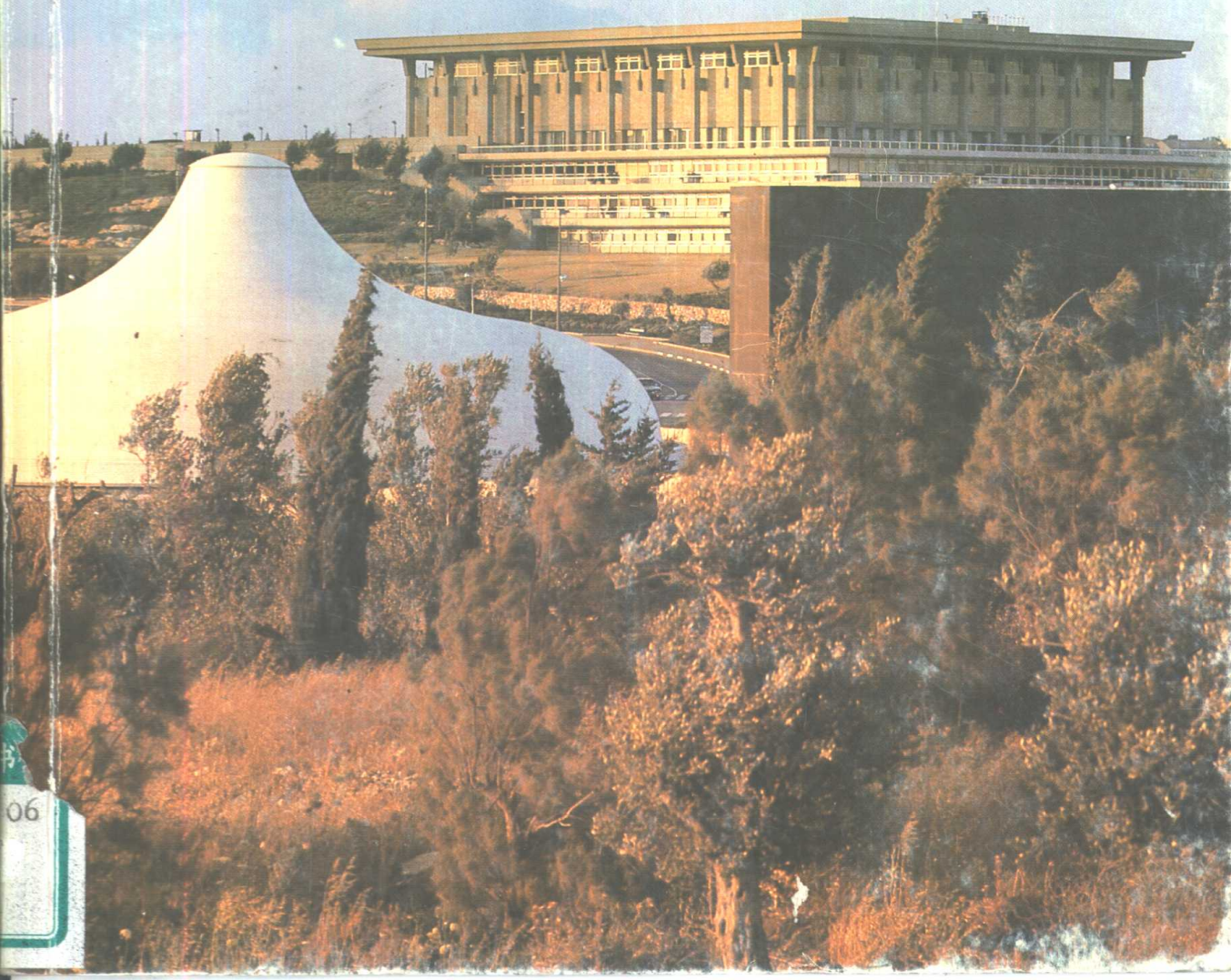


亚利伊勒

以色列文艺评论集



דבר איואל איואל קיון אעד יווי

אריאל

亚利伊勒

以色列文艺评论集

耶路撒冷/北京/1995

גור ארואל ארואל קרמן חנני חנני

אריאל

亚利伊勒

以色列文艺评论集

耶路撒冷/北京/1995

编辑：阿谢尔·韦尔

助理编辑：阿洛马·霍尔特

设计：亚历克斯·伯林恩

中文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兹奉上专为中国读者编辑的《亚利伊勒》特刊。《亚利伊勒》为文化季刊，以英、法、德、西、俄及阿拉伯文等 6 种文字定期出版。如
有意收阅其中一种文版，盼即赐示。

ISSI 0004—1343

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 文化处

电话：505 2970 传真：505 0328

地址：北京 国贸大厦

外交部 文化与科学关系司

出版者：尤沃尔·塔尔有限公司，耶路撒冷 91021 第 2160 信箱

目 录

希蒙·佩雷斯	序言	5
雷切尔·弗斯坦伯格	希伯来文学现况	6
亚埃尔·伊斯雷利	博物馆与考古学	12
阿摩斯·奥兹	黑匣子	31
阿尼塔·库什内	当代以色列的具象油画	50
丹尼尔·罗果夫	以色列烹调	61
沙博理	在中国的犹太人	72
梅纳什·哈尔埃勒	犹太人与伟大的丝绸之路	86
以色列歌吟		101
厄莱兹·比通/叶胡达·阿米恰/摩希·本-肖尔/特·卡尔米/摩西·道尔/佩雷兹·德罗尔-巴奈/安纳达德·艾尔丹/海米·古里/艾因·希莱尔/阿摩斯·勒维坦/阿基·米肖尔/丹·帕吉斯/达利亚·拉维柯维奇/阿休·雷区/图维亚·路布纳/哈罗德·希迈尔/阿哈龙·夏布太/阿里叶·希梵/罗尼·索马克/米夏尔·斯尔纽涅特/奥狄德·斯维德立克/阿优斯·耶胡伦/纳坦·萨区		
内亥米·迈耶斯	希望之光的科学	125
本-锡安·菲什勒尔	教成人学希伯来语	136
茨维·阿夫尼	当代以色列的音乐潮流	145
米里阿姆·亚希-瓦赫	以色列的儿童戏剧	154
阿·卜·耶霍舒阿	莫勒霍	161
供稿人		173

封面：“藏书圣地”，死海卷轴就藏在这里。背景为以色列国会。

序 言

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在分隔许多年后，终于又团聚了。我这里指的是中国人和希伯来人。中国人运用文字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字在中国文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国人还发明了纸。以色列人民（即希伯来人）写出了圣经，圣经是人类“众书之源”。

中国和以色列在1992年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1993年5月，我在北京签署了两国文化协定，我个人对此深感自豪和高兴。

建交以后，中国和以色列的接触在许多不同领域迅速增加，外交、经济、贸易、农业和文化领域均如此。最近，中国要出版一本以色列散文和诗歌选集，我很高兴，这本专门为中国读者挑选的散文、诗歌和小说的专集，以色列文化艺术杂志《亚利伊勒》（耶路撒冷别称）的一期特刊，即将与读者见面。我希望，特刊的问世，将为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色列的许多其他出版物开路；我也希望，我们将读到日益增多的为以色列读者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和希伯来人曾有过交往。有的权威人士声称，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征服以色列后，犹太人开始定居中国，他们是“十个失散的部落”之一。但是他们的观点缺乏证据。然而，犹太人显然在唐朝（公元618—907年）开始定居中国，而且日益频繁地沿着伟大的丝绸之路来往于中国和近东之间。犹太人受到中国人的热情欢迎，到公元十二世纪初的宋朝，他们便在古都开封定居，并修建了第一座犹太教堂。《亚利伊勒》（耶路撒冷别称）这一期特刊，登载了几篇追溯这一段历史的文章，如在中国住了十多年的犹太人悉尼·夏皮罗的《在中国的犹太人》和梅纳什·黑尔教授的《犹太人和伟大的丝绸之路》。

我确信，尽管两国疆域差异甚大（以色列全部人口还不及中国一个大城市多），两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文明古国对人类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之间将建立起更多的联系。

以色列外交部长 希蒙·佩雷斯
耶路撒冷，1994年7月

希伯来文学现况

作者：雷切尔·弗斯坦伯格

目前正是以色列文学特别是希伯来小说焕发勃勃生机之时。《神秘教义》对这些时期的丰硕成果作了描述，它说，当灯光大得连灯罩也容纳不了它时，受抑制的灯光就会把灯罩震碎，让光和热冲向世界。

如果说历经纳粹在欧洲的大屠杀所带来的死亡衰落之后还有任何堪以自慰和一丝胜利的喜悦，那就是，犹太文化以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形式生存了下来，并正在茁壮成长。或许，正是由于大屠杀或者由于希伯来文学过于年轻，也不过一百来年，以色列人才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活力。有时，他们似乎急于宣布，“瞧瞧我们。我们的文学生存下来了。我们生存下来了”。

不管集体的心理如何，客观形势是，在过去 15 年里，许多文学历史线索都被串在一起，创造这样的浓度和溢流。什么迹象和证据可以说明这种文学繁荣、这种生气勃勃和这种活力呢？首先，几乎每个月都涌现出若干名新的年轻作家。他们虽然不全是马奎兹和福克纳（以色列小说家最喜爱并加以模仿的作家），但是都有许多独创性的见解。而且种类繁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正在出现。其中，有女作家的作品，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即使在这个小国里），有少数民族的作品（虽然不如人们希望的那么多）。同时，第一次出现了消遣性小说，独特的希伯来神秘小说。贝蒂亚·戈尔写了一本智力性的侦探小说，它已被译成几种文字。舒拉米特·拉皮德的小说也在翻译中。她创造了一个神奇的女侦探。在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啤酒店的一名记者莉齐·巴迪奇，长着一双大脚，摇晃着廉价的长耳环。她的著作读来象是社会评论，暴露了那些大权在握的统治集团人物的弱点和腐败。

至于读者，调查报告表明，年轻人读得少些，这是从全球范围来说的，但在以色列，总起来看，有它自己的读者。二三十岁的人热衷于小说，而不关心犹太人命运一类大问题。他们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市郊和邻近地区。比如盖迪·陶布（出生日期不详）那一类青年作家。他的处女作最近已经出版，他们的小说平淡无味地描写着特拉维夫市的日常生活情景。卡斯特尔-布卢姆，这一位新一代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她以一种自我嘲弄的、与人疏远的特拉维夫腔调，描述了我们内心里深藏的恐惧。她的《玩具城市》一书出版于1992年，她与耶赫迪特·凯齐尔的著作《封闭海洋》一样，顷刻之间便畅销全国。这次文艺复兴的最令人瞩目的特点之一是，新作家辈出，老作家再放异彩。人们很难用语言来表述这种能量和热情的外观，但是人们不能不感觉到它的存在。看来，它已感染了以笔名斯·伊扎尔发表著作的依扎尔·斯密兰斯基。他的自传是一本令人惊叹不止的忆旧小说。依扎尔年已七十古稀，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年代的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以及描述1948年独立之战的千页巨著《Days of Ziklag》被认为是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它们对先驱的社会和英雄主义等人们所接受的真理提出了质问；他代表了主张以色列人正确对待国内阿拉伯人的良心的呼声。虽然依扎尔曾有一小段时间是以色列议会的成员，但可以把他看作是哺育后一代作家，诸如阿·布·耶和華、阿莫斯·奥兹以及戴维·格罗斯曼等人的反统治集团的政治意识的先驱。虽然，依扎尔自60年代初期便停止写作，但是，现在他又重返文坛，他的抒情作品和表现主人翁潜在意识的自传体作品都相当成功。他的复出大概有他自己的理由，如弄清确实的死亡人数和重新修订与出版他的《Days of Ziklag》。但是目前流行的、有感染力的文学气氛可能也起了作用。那末，这种复活是什么造成的？近期以色列文学的旺盛又赋与什么特性？

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文学发展作近期的透视——不必回溯一百年来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创立，而是回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新文学时代以来的情况。那个时候涌现了所谓“建国时代”作家，他们是以色列从事写作的，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这一代中三位一体的巨头是阿·布·耶霍舒阿，阿莫斯·奥兹和阿哈隆·阿佩尔菲尔德。由于他们的著作的力量，他们个人的倍受欢迎以及他们几乎适应了国家的需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继续统治了文学舞

台。

最初，奥兹、阿佩尔菲尔德和耶霍舒阿对他们的前辈“帕勒马赫同代人(Palmach generation)”^①的现实主义作出了反应，并写了一些抽象的、象征性的寓言。他们试图放弃上一代那种强调集体的思想——他们已经吸收了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先驱，译注）和欧洲的存在主义，又常常受到文学大师阿格农（1888-1970年）的著作的影响^②。因此，他们试图写个人，而不去涉及集体。但是他们不能把自己解脱出来。国家还太年轻，犹太人的命运还至关重要；他们既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又不能避开。文中有关集体的内容仍然时有表露。

显然，奥兹、耶霍舒阿和阿佩尔菲尔德写的是个人和家庭状况（奥兹最近说过，他最感兴趣的是写家庭，写神学与上帝格斗）。但是，他们的著作经常是为满足象征的或寓言的需要而构筑的。家庭情况常常成为体现更大的以色列集体经历的范例，成为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正常状态”的探讨。对阿佩尔菲尔德来说，早在大屠杀之前的20世纪，犹太人便已成为犹太民族的象征，当犹太人慢慢剥去其受欧洲文化的影响的外衣时，还抱着不相信的心情。

这类象征性的作品，特别是奥兹和耶霍舒阿的作品，其必要的假设是，有一个可以寓言化的坚实灵感。有一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男性的，它是先驱的工人运动的产物，故称作阿什肯纳齐，是犹太人的。也可能有其他作家，女的，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的，共产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但是他们被认为是“次要的”。人们不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集体经历的反应。

当然，更不会有阿拉伯作家，因为他们不能代表犹太人的集体经历。此外，还有许多卓越的作家被埋没在较次要的文学团体里，因为他们本身不关心如何象征这一集体经历；耶霍舒阿·克纳兹所写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奇异的作品，耶沙耶霍·柯伦描述莫沙夫（以色列农业合作居民点）生活的辛辣；阿玛莉亚·卡哈娜-卡蒙被埋没在“用少女眼光观察生活而创造的绚丽的小说的女人队伍”中。

但在1977年发生了变化；利库德党执政，赢得了一大批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选民。这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国内出现了较大的文

化与政治的多元论。它确定不只是一个工党，一种先驱的、男性的经历才可以寓言化；这样遂开始了承认描述个人经历——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是为了集体的象征性价值——的合法性的进程。即使在那时，仍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史诗，如梅尔·沙莱夫那本畅销书《Roman Russi》（英译本译名为《蓝山》），它不象征什么，而只是逗乐的奇谈怪事。

但是在 80 年代，禁锢着描述个人经历的潘朵拉盒子终于打开了。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经常被视作奢望的那种追求表现自己的小天地而又受抑制的能量爆发出来了。特别是那些女作家，他们经常被视为偏于描述个人的次要作家，获得了合法地位。当然，欧美涌现的妇女小说浪潮对以色列也有推动。妇女们跃跃欲试促使女子作品激增。较老一代的女作家阿玛莉亚·卡哈娜-卡蒙和耶胡迪特·亨黛尔成为多产作家。显然，前十年的女子作品大部分并不反映有纲领的男女平等主义。作家们自己也并不这样认为。但是，只要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就可以看出其中深藏的满腔怒火，而较老的妇女在表现这一方面并不亚于较年轻的妇女。耶胡迪特·亨黛尔的《友人 B 的宴会》一书，令人寒心地描述了一位身患癌症濒临死亡的女人，她从病床上爬起来，站在人间和地狱的边缘上，做完宴会所需的种种琐事，操心着肉上所浇的酱汁是否对味，客人的座位安排得是否妥当——而她的丈夫不可避免地业已安顿好一位比她年轻的配偶来接替她。

在较年轻的女作家中，奥尔莉·卡斯特尔·布卢姆（生于 1960 年）的《玩具城市》才华横溢地把作父母的矛盾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她的女主人公为她那婴儿的病弱以及等待着他的危险愁得简直是发疯了。为了缓减这些危险，她作为一名医生，为婴儿动了手术，使用了几桶红汞，并进行化学疗法。当然，她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健康，但是她也使孩子遭受了浩劫，表达了她对父母身分的一种敌意。

耶胡迪特·卡齐尔（生于 1963 年）的小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妇女作品。小说中包含许多从越来越意识到成年人生活的悲惨的人们所看到的童年时代那种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的形象。它们拨动了以色列国民心灵中一根深沉的和弦。他们似乎急需找回他们在童年时代的无拘束

感和自在感。

并非所有的以色列作家都认为童年时代是一座玫瑰花园。达维·格罗斯曼（生于 1954 年）的小说奇怪地指出，儿童们渴望着窥破成年人世界，与世界的阴暗面作斗争，并担心他们将来有无能力在成年人王国中在性别方面起作用。

1977 年以后多元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那些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带来的，他们为逃避建国后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于 50 年代移居以色列。到了 1977 年，他们已到达法定年龄，要求分得一块馅饼，要求在国家的指导中有他们的发言权。但是，新的多元论在文学方面把妇女推到了前列，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等少数民族有了许多发言权。事实上，以色列妇女文学中一个看不见的因素是少数民族妇女的经历，它们已在美国找到了这一类肥沃土地。

以色列文学渴望出现能够捕捉移民心头创伤的新的、年轻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作家。阿尔贝特·苏伊萨（出生日期不详）是迄今出现的唯一青年作家。小说《Akud》（伊萨克写的《牺牲》）的三部曲以奇异的风格和隐喻的手法描述了在耶路撒冷贫民区内成长起来的摩洛哥人，传统的父亲与在以色列出生的儿子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同样有趣的是，新近的开放影响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作家。如阿·布·耶霍舒阿，他并不属于 50 年代来到以色列的移民。事实上，他的祖辈在 19 世纪初期就来到了以色列故土。这些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要比阿什肯纳齐犹太人更为“贵族化”，最后他们是溶合在一起了。但是耶霍舒阿的早期作品中没有一篇谈到过他那与众不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的根源。实际上，他的作品象征着以色列阿什肯纳齐犹太人的经历。只有到了 80 年代，他才开始创造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特色的主人公。在《马尼先生》一书中，他探测了他的最深层的文化自我，创造了一部巨著描述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家庭五代人的故事。

另一位较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作家萨米·米哈尔（出生于伊拉克），看来是近期的多元论气候中成长起来的。他的著作《维克托

里娅》描写了一名少数民族妇女的精神和艰苦——这一主题至今尚没有女作家涉猎。直到这种多元论扩展到希伯来文的阿拉伯人作品中，安通·沙马斯（生于1950年）的醇厚著作《阿拉伯风格》的问世，才给人以印象。以色列阿拉伯人写希伯来文学这股风将发展下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去年以色列奖金的得主，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埃米尔·哈比比，但总的来说，他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最后，还应指出，今日以色列文学舞台上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方言，使用日常街头用语。在这方面，1977年是它的转折点。因为在那一年，已故作家亚科夫·沙卜泰出版了他用意识之类的写法，特别是用“过去进行式”和“过去完成式”的时态写成的特拉维夫世家小就，用他那神奇的耳朵和不可思议性捕捉住人们交谈中使用的土话。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接受了这一影响。当然并不凑巧都是关于特拉维夫世家的小说。国家的日益都市化，以色列商业和用户第一主义的大跃进，都以特拉维夫为中心点和支点。伴随而来的，在特拉维夫出现一个一度称之为“雅皮士”的阶级。这一集团有一种强大的、自信的自我形象，甚至可称作是“一股自吹自擂的傲气”——以及被特拉维夫当地报纸喂大的贪得无厌的文化胃口。这些报纸为我们传递语言。它们告诉我们特拉维夫街头土话怎么发音，什么意思。这对当代以色列作品产生了强烈影响。就是这些报纸上的坦率的、时髦的本地话的语调渗透了许多新小说和传记。奇怪的是，虽然这些青年作家为他们的世故和在文化上的处世本领而引以自豪，他们还没有精疲力竭。这些新的年轻作家相信，仍然还有一些没有讲而该讲的东西。这可能是太天真了。但是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注①在帕尔马(Palmah)(以色列国防军的先驱者哈加纳的前线部队)作战过的作家。他们包括伊兹哈尔，莫谢·沙米尔，哈诺赫·巴尔-托夫，哈伊姆·古里等。

②塞缪尔·约瑟夫·阿格农，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唯一以色列人。

博物馆与考古学

作者：亚埃尔·伊斯雷利

在以色列，考古工作的范围与建筑、定居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成正比，这种发展——在近似辩证的进程中——摧毁了古代的残存物，但同时又发现了他们，使人们能够据此进行研究。博物馆在人们寻找一些特性和根源以说明以色列人与古代遗迹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使公众可以接触到考古学家的发现。

萨穆埃尔·卜龙夫曼圣经与考古学博物馆是以色列博物馆的考古学分馆，它几乎是在一无所有中创建的。它的前身是古物部的一个小博物馆，它保存着建国以来发掘出来的人工制品。后来成立古物博物馆时，该馆连同工作人员一起调归以色列博物馆，今天已发展成为重要机构。

博物馆的指导思想是，应通过考古的发现，对照历史的背景和书本上的证据来说明物质文化的发展，叙述自古以来以色列故土的历史。永久性的展览是按年月次序安排的。某些题目论述得较深，而邻近的画廊则专用于有关的特殊题目，临时性展览允许详细处理最新发掘的重要发现或详尽说透某些特别问题。大部分人工制品是古物部的财产；某些是捐赠的，极小数是博物馆获得的。

在下面的概论中，我将努力指出博物馆中已经有的重要的发展。

考古研究的魅力在于它阐明了开古以来的人类历史，解释了事件的次序和发生的原因。这是人类在普遍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在以动植物世界为背景的地理结构中的历史。资料的贫乏使我们不得不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可以得到的一点点资料中尽可能地学到更多的东西。根据这一研究，今日的倾向是把世界这部分地区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距今一百多万年以前。

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经过多次发掘所发现的人工制品已经使

史前考古学家能够再现当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这一地区的人们靠打猎和采集食物为生，人类发展的图画便变得较为清晰了；虽然许多问题仍然无法解答。博物馆在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难以将其传播给公众之后，便将史前画廊重新作了安排，以显示人类的发展，直到人类与动物同在一个环境里生活为止，这里有人类使用的工具和器具，制作这些工具的技术以及艺术萌芽的模糊想法——其中的一幅是在石板上刻下一匹马，此画本身是在本地区发现的造型艺术的最古老的证据，确定的年代是公元前三万年。纳图菲安时期（约在一万二千年前）以来的装饰用人体动物塑象发掘出来的数量较大。这些发掘物表明，人类制作各种材料的能力及其审美感的发展，使他们能够生产出富于表情的雕刻和用骨与贝壳制成的细巧饰物。装饰品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加利莱地方的哈约明墓中一女尸的盆骨周围那串用狐狸牙齿做成的饰物。纳图菲安时期的习俗是埋葬死者要伴以饰物，这引起了一些至今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死者是否要象活着时候那样带上饰物，或者，它是否会有安葬仪式或尊敬死者这一类特殊的作用？

深入研究了国内不同地区情况之后，结果是，古代拓居地的地图已经填齐，过去不知道的地区和时间，现在已为人所熟知。五千多年前的一幅农牧业生活地区图，经过对戈兰高地的调查与发掘已修复成原样。在哈尔科利提克时期（公元前 4000 年至 3150 年）的拓居地，发掘出刻有人面和兽面的黑色高脚碗，鼻子突起。哈尔科利提克人工制品的这些特色在国内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当博物馆把它们一起展出时，它们创造了一幅充满解不开的神秘的、感人的文化图画。

阿拉德的发掘显示了公元前三千年城市史初期的生活情景。这些发掘是以色列博物馆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实现的，它展示了社会拥有生产资料向集中的人口供应食品的情况。在阿拉德，五千年前，城镇的不同职责已经集中起来；经过发掘显示了寺院、宫殿、商业中心以及相当数量的、大小和形式一致的住宅单元。在住房内发现的器皿被送到博物馆的实验室内进行修复；经过刻苦的分类，才从变黑的残存物中分辨出当年阿拉德居民种植和吃的食物只是小麦、青豆、小豆、橄榄和葡萄。与西奈南部和埃及的商业联系也显示出来了，特别重要的

发现是，一只陶瓷坛子刻着埃及第一朝代第一位国王的名字“纳玛尔”，从年代上清楚地提供了阿拉德与迦南和埃及之间的联系。

圣经的读者知道迦南人的迷信和宗教，历史书和预言书对他们的描写都是些消极的联系。在对公元前的考古学的发现的基础上，一幅有关这一世界的全面图画已出现在特别画廊上。展览的中心是从拉希什发现的福塞寺院，这是按它被发现时的最后时期的模样画出来的全面详细的建筑模型，附有同时发现的一些祭品。有几百件文物，包括饰物、象牙雕塑的人象和兽象、粘土和玻璃器皿，都具有高度的技术和艺术的技能，使人们对于世界充满了信念和传统，象征和神话形象有一些了解，同时说明了迦南人宗教仪式的富有和繁荣。

画廊所展示的许多迷人的文物中，有两件还是最近发掘的：一件是在拉希什发掘出来的一枚小小的优美金质奖章；另一件是在贝特谢安发掘的陶器铸模。两件文物上都有一尊站在马上的赤身女神象。铸模是用来制造带有女神浮雕的粘土奖章的。

公元前二千年埋藏下来的发现物表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贸易图画，证明了社会及其拥有物、风格和影响的流动性。国内各地已对公元前 14 世纪到 13 世纪迦南贵族与富人的坟墓进行了发掘，证明了这一世界主义是客观现实的。在发现物中，博物馆已展的有来自北方的泰尔丹、沿海的阿卡、以及位于犹地亚山麓戈泽尔的埋葬物。这些收集物包括奢侈品和金首饰，武器和图章，来自米西纳和塞浦路斯的陶器器皿，以及来自埃及的玻璃和彩陶器具。

经过一定的年份，博物馆的收藏物逐渐增加，许多物品与迷信、宗教和埋葬有关。在古代，人们不懂得单纯为了美的满足或是为了自我表现而进行的艺术创作；一切装饰品均涉及到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实用。在这些创作中，有一些杰出的作品，由于它们很少艺术性，反而引起了发自内心的和感情上的反响。

在表现人与自然作斗争的精神的发现物中，最令人惊叹不止的是模制的头颅——人类的头颅是在泥土塑象的模子里制成的，脸部各有特色。这种类型的颅骨是在约旦河流域发现的，年代在公元前七千年；它们看来是祖先崇拜的最古老的证据，可能意在保护宅内的居民。



最近发现的一个石制面具可能也含有同样的目的，年代属同一时期。这个面具的四周有小洞，从它的大小来判断，可能是在举行典礼时供活人或死人戴的。它们的特点——两个眼窝，一个小鼻子，一嘴的牙齿而没有嘴唇——外表活象颅骨的样子。我们仍在努力抓住这类物件的全部含义。

在内盖夫的吉拉特发现的两件雕刻的陶器器皿，一件上面有女人的形态，而另一件上是一只公羊，它们所表现的思想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它们是在红铜时代的寺院里发掘出来的，年代在公元前四千年。从外形和细节的表现看，它们是图样设计和艺术常规的迷人结合。该女子坐在凳子一类的东西上，她的右手举起抓住头上的盛奶罐的边沿。公